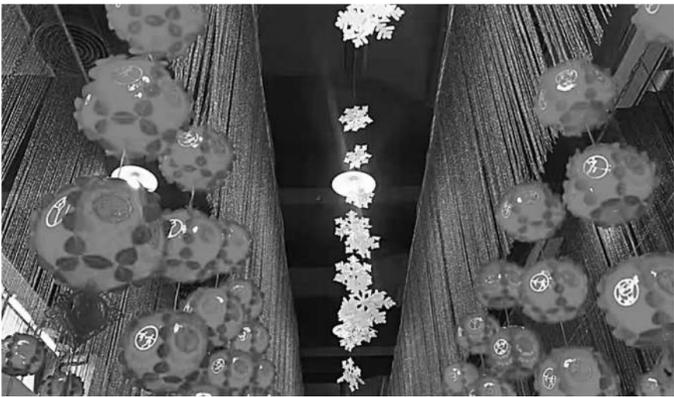


年味最有老子的智慧

刘宁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日，每当它来临，心里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激动与期待。其实，在中国所有的传统节日里，春节的内涵很是微妙。七夕会想起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端午会想起屈原泽畔行吟，中秋更是伴一轮明月、享受阖家团圆的日子。春节似乎包含了很多很多，又似乎只集中在一个很抽象的新年的“新”字。

其实，这个“新”字恰恰是极丰富的。“新”是新的开始，旧岁中一切纷杂，在除夕的爆竹声中，都仿佛消失，人生和世界都有了个新的开头。王安石在《元日》中说：“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明初诗人卢颙说“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己酉新正》）。伴随着冉冉升起的旭日，春意洒满山河大地，所有人都在为新的开始而欣喜。新年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充满无限的希望。

“新”还是心灵的焕然一新。只有忘记了旧岁的种种纷杂，我们才能和更本真的自己相遇。《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陶渊明在《饮酒》中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其实每一个新年，都是让我们放下奔波劳碌，回到最质朴的亲情的中，回到最放松的自在与自得里。在新年锣鼓的狂欢中，每一个人的兴奋，都带着孩子的天真。

春节在历史上形成的习俗，大概是所有传统节日中最丰富的，忙年、除尘、祭灶、贴春联、包饺子、祭祖、守岁、放鞭炮、拜年、走亲戚……真是数不胜数。人们用各种

努力，来表达除旧布新的美好愿望。一个“新”字如此简单，但对“新”的祝福，却是最难表达的。我们在明月下，和家人一起品尝月饼，就会感到中秋佳节的满足；在五月的清江上赛龙舟、吃粽子，就会感到过了一个充实的端午节，但是，怎样才算是一个年味满满的春节呢？其实是很难有答案的。吃了年夜饭守岁的人，可能会遗憾自己没能在腊月里为新年做好准备；而正月里是否要天天庆祝，直到元宵节，一个新年才算完整？

《二十四诗品》中曾经精妙地写道：“如逢花开，如瞻岁新。”这动人的体验，是属于诗中的“自然”一品。想想真是令人叫绝。鲜花初绽，新岁初临，这原是一种天地之自

然，无论是隆重庆祝，还是悠然陶醉，新年的新意永远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如此令人兴奋，却又不知该怎样待它、怎样祝福它才好，这难道不就是老子所说的“道”，恍兮惚兮，难描难画！

看来要体会春节最浓的年味，不妨品味一下老子的智慧，在辞旧迎新的这一刻，放下疲惫的行囊，停下奔忙的脚步，无论是放声欢笑，还是与亲友温馨团聚，都真正卸去烦恼，在轻松与欢快里体会精神的新生。万象更新的世界，可以重温人生的初心，初心如此澄澈，有生生不已的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浅析廖承志的一封信电报

史宝强

“五一口号”的发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其发布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关于“五一口号”发布的缘起，却广泛流传着一个传奇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故事大意是，1948年4月时，廖承志率领新华社社驻扎在河北涉县的西戎村，当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时，他给中央发了一封请示电报，据说电报内容非常简短，而且有点儿不雅，内容大概是“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正是由于这封信电报，引发了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人们把这个故事称为廖承志“问屁”，把这封信电报称为“问屁电报”。

这个故事和这封信电报由于太过传奇和精彩，流传之广、被引用之多超乎人们的想象，频频出现在专家学者著作、各种期刊文章、影视作品等中，甚至在某些权威党史书刊里也多次出现。

流传时间久了，讲述的人多了，人们就顺其自然地信以这个故事为“真”了，但一些严谨的人，心头却存在着一连串疑问，这个故事是真的吗？有没有这封信电报？电报内容是这样吗？

笔者为了考证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多方求助并翻阅了大量资料，虽然没有找到多少有价值的史料，但也愿意对这个故事和这封信电报做一分析。

“五一口号”发布前后这段时间，中共中央正处于指挥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前夕。在西柏坡，中共中央主要是靠发电报与各战场、各方面联系，与远在涉县山坳里的新华社联系也主要是通过电报方式。据中央档案馆和新华社的一些史料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与新华社电报往来十分频繁，决战前夕，又逢重大节日，处于与国民党政治斗争前沿的新华社和社长廖承志向中共中央发请示电报的行为，在逻辑上与当时中共中央进行政治、军事的斗争需要是吻合的，这也是这封信电报为很多人相信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柏坡时期，虽然仍是紧张的战时状态，但中共中央的档案管理已经比较严格和规范了，这一时期绝大部分档案保存是比较完整的。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转移之前，中央办公厅对各单位档案管理工作有过专门安排，1949年2月25日发出的《机关、部队转移前后应该遵守的事项》规定：“对各种档案、文件、电讯及一切有关机密材料，应立即进行清理登记、包封，妥为装箱保管，临时使用之材料，应责成专人携带。凡有已失时效，又无须带走的文件材料须焚毁时，必须经本机关最高首长批准，并有两人以上在场始能焚毁。”“详细检查一切不令人注目的偏僻地方、收检片纸只字”。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机关在离开西柏坡时“片纸只字”都没有丢下，假设确有廖承志的这封信电报，也不可能丢在西柏坡。那为什么中央档案馆查不到呢？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时，此电报由于过短或者因电文不雅被列入“焚毁”之列；二是此电报仍在，只是“沉睡”在档案馆的某个“角落”里而未

有被工作人员查到，或者是查到了但还不宜公开。在当前情况下，对其无法下有与无、真与假的结论。

虽然查找不到故事流传的源头，但并不能就此说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

笔者曾尝试着追溯故事流传的源头。一方面从“三亲”史料里追，翻阅了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有可能属于“三亲”范畴（包括廖承志本人）的人物回忆录、纪念文章、日记、传记、年谱等资料，结果有关这个故事的相关记述一无所获；另一方面是请教引述者，电话联系了几位统战历史研究专家、专著作者，结果是他们对此故事的源头也是含糊不清。笔者也曾与几位党史工作者、学者探讨过此故事的真实性，有的认为是民间流传、以讹传讹，有的认为是并非空穴来风、凭空捏造，各有各的观点，谁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说服别人，最终仍然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鉴于故事本身流传的广泛性与历史背景的重大性以及主人公党史地位的重要性，不能简单地“空穴来风”“凭空捏造”的结论。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自然不会把某个个人的个人意志所左右，但在必然性中也有偶然因素的存在，假如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那么他就是“五一口号”发布过程中的一个偶然因素，这个偶然因素顺应了历史发展大势，在某个关键环节起到了推动作用。一般来说，在这么重大历史事件上编造一个令人称奇的偶然事件的可能性不大。廖承志本人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直到1983年才去世，而“问屁”故事流传已久，而且范围甚广，但从没有听到过廖承志生前否认此事的消息。这种情况在党史中并不罕见，例如中共秘密党员、著名民主人士胡愈之，1948年9月由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的途中，发表了一番关于解放战争进程的“高论”，引起旅大党委重视并派专人护送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当年11月14日新华社社社对外宣称改变了解放战争的进程表，此种改变是否与胡愈之有关，他是怎么样向党中央汇报的，中央是不是接受了他的建议，胡愈之直到逝世，自己从来没有提及过此事，要不是当年旅大党委负责人李一氓后来披露，恐怕现在也成了悬案。再比如，毛泽东的老师、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符定一，受中共中央邀请到达西柏坡的当晚，就向中央提出“武攻天津卫，文保北平城”的平津战役策略，但符定一从来没有向外界透露过自己的这个建议，要不是随符定一到西柏坡的女儿符立达对此事有所回忆，人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符定一的历史贡献。廖承志、胡愈之、符定一这些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无一例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绝不会把个人的偶然因素与历史的必然性相混淆。虽然廖承志本人从没有公开承认过“问屁”故事的存在，但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其没有存在。

廖承志其人的政治经验和幽默性格，有做出这种传奇行为的可能性。

人们之所以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产生怀

疑，主要是因为故事本身太过传奇，电报内容太过“荒唐”，难怪人们有这种疑问。廖承志就是个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太多太多，单就坐牢一事，有人统计，他的一生中平均7天就有1天在牢狱中度过，但什么时候都是潇洒豁达、幽默风趣，与廖承志共事过的人对他有一个共同的印象——生性幽默。

以廖承志的传奇经历、幽默性格和任新华社社长的政治敏锐性，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针对南京仍“国民大会”召开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发出一封信电报，其可能性就会容易被人们理解了。

一个美国人的模糊回忆，间接指向了“问屁电报”的真实性。

在查阅有关资料过程中，当被一无所获的沮丧情绪所笼罩时，柳暗花明地忽然发现了一丝痕迹，这个痕迹的提供者居然是一名美国人。

李敦白（1921—2019），美国进步人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唯一的外籍党员，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很多中共高层领导人有过密切接触，也亲历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是“跻身核心圈的独一无二的老外”。1945年来中国，1946年先后在张家口、延安新华社广播电台从事英语广播稿的编辑和播音工作，他受廖承志的领导，也是廖承志的好朋友。

2009年，河北电视台为了制作大型历史文献片《新中国从这里走来》，采访了大量与西柏坡有关的历史人物，其中包括李敦白。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1948年的时候，当时新华社发表‘五一’口号。4月底，马上就要‘五一’了嘛。按照惯例要发表东西是吧？当时这个影响挺大的。当时的情况是廖承志首先给中央发电报。‘五一’的时候还没到平山。”

凡是采访过李敦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虽然年事已高，但记忆力惊人，所以他的回忆可信度比较高。这段回忆文字说明，当时李敦白就在涉县的新华社工作，对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这件事印象深刻。最难得的是他明白告诉了人们，廖承志在1948年五一前夕按照惯例给中央发了电报，间接佐证了电报的存在，但遗憾的是李敦白并没有说明电报的内容，记者也没有就此事进一步追问，弄个水落石出，错过了一次检验其真伪的历史性机会。从亲历者回忆历史的角度看，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由于李敦白的口述过于模糊，虽然给了人们一丝的痕迹，但作为历史研究来说，这一丝痕迹太淡了，无法作为严谨的“证据”。

证明廖承志“问屁电报”是否存在，鉴定故事真伪，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并无多大实际意义，但对于党史研究来说，可谓意义重大。一是可以加深对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研究，丰富党史的细节；二是对新时代领导干部如何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随着时光流逝，这个故事可能永远无法去证明它的真实性了，但这并不影响党史的主脉，反而衬托了党史的丰富性。

（作者单位：河北省统战部）

编者按：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经典滋润着中国人的心田，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代代传承，不断发展。本版开设“学术随笔”系列专栏，邀请学者撰文赏析、品鉴经典。首期为南开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余才林的“唐诗品鉴”，与读者共同领略唐诗的精深世界。

王维以山水田园诗著称，诗集中的山水田园诗反映其隐居生活，代表作有隐于蓝田辋川时所作《辋川集》。

约于天宝三载或稍前，王维得诗人宋之问蓝田别墅，别墅在辋川山谷，其地奇胜，有华子岗、敬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洲、辛夷坞等。王维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游历其中，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又汇集当时所作山水田园诗，号《辋川集》。《辋川集》诗二十首，吟咏辋川各处景象，一处一景，一景一诗，其中最著名的是下面这首《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鹿柴是辋川的一处篱落，也是一处景点，诗写诗人在鹿柴的见闻感受：空旷的山谷寂寂无人，只是听到人语的回响。夕阳的返照透过密林，晖光投射在满是青苔的地面上。置身鹿柴，耳目目睹的是一片远离尘嚣的空静而又幽寂的景象。

历来诗评以为此诗有禅意，得其旨趣。诗前两句以人语的回响表现深山的空静，吸收了佛教中的意象。佛教谓万法皆空，世间一切皆为虚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序品》说：“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响、如镜、如响、如梦、如影、如镜中相、如化。”所谓“十如”，其中诸法“如响”就是表现万物的空无虚幻。《维摩诘经·弟子品》还说：“所闻声与响等。”说声音与回音相同，都是虚幻不实的。此句借禅注云：“未有因山响而致喜怒也。”闻山响而无喜怒，乃是因为山中的回响虚幻不实。可见，在佛教教义中，“响”即是空，诗写山中“人语响”，即表现这种佛教意味的“空”。山中不仅空无一人，而且即使偶尔听到的人语的回音也是空无虚幻的，因而“空山”不仅指空无所有，还意味着山中一切皆虚幻不实。此诗前两句写景，同时融入了诗人对佛教的领悟。

不仅如此，此诗之有禅意更在于诗歌的表达方式。清李颀《诗法易简录》卷十三评此诗说：“人语响，是有声也；返景照，是有色也。写空山不从无声无色处写，偏从有声有色处写，而愈见其空。”山谷原本空廓虚无，万籁俱寂，忽而听到人语的回响，因之更显其空廓寂静；山林深僻，人迹罕至，飞尘不到，显得清幽暗淡，一缕微光返照透过深林映照青苔斑斑的地面，深林愈见其暗淡清幽。这种以动示静、以有形无的手法出自佛教禅宗思维。佛教禅宗认为动静不二，有相即，南朝僧肇《物不迁论》说：“寻夫不动之作，岂躁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躁动。必求静于躁动，故虽动而常静。不躁动以求静，故虽静而不躁动。”不躁动而求静，所以静中有动，诗中“人语响”即用此理。王维山水诗多写此类境界，又如《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人闲花落，夜静山空，本来是一片空静，忽而听见山涧传来时断时续的鸟鸣声，山间显得更为幽静，也更为空廓虚无。空静于有动中求，有动的本体是空静，所谓“虽动而常静”。山

空静之美

——读王维诗《鹿柴》

余才林

间人语的回响及鸟鸣声，偶然响起又归于沉寂，正如寺院钟声，从静寂中响起，又消失在静寂中。声响不过暂起，而空静是永恒无限的。

万物归于空静的佛教观念也见于《辋川集》中的其他诗歌。如《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涧户因无人而寂静，芙蓉花纷纷开放，又纷纷凋落，随起随灭，归于永恒的寂静。再如《栾家濑》：“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榴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末句写白鹭惊起高飞，继而复下，归落本处。此后，依然飒飒秋雨，浅浅石榴，依然跳波相溅，白鹭孤栖。这里原本沉静，白鹭的惊飞打破了这一沉静，随着白鹭的归落，一切又归于沉静。这两首诗所表现的境界与《鹿柴》相近，只是《鹿柴》出之以声，而此二首示之以形罢了。

《鹿柴》及前引诗歌中的境界一般称为禅境，既然禅境中的空静于有动中求，那么禅境呈现的就并非一片死寂。宗白华《美学散步》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能观之心如此，所观之境也如此。禅的心灵状态落实为禅境，“飞跃的生命”不仅是禅的心灵状态，也是禅境之所呈现。人语响，鸟鸣声，花开花落，白鹭惊飞，无一不是“飞跃的生命”。不过，《鹿柴》因为刻意表现诗人对空静的领悟，宗教的冥想凌驾于现实的观感，大自然中偶然的灵动被无边的空静所吞噬，因而诗境不免染上浓厚的空寂幽冷的色彩。

明代胡应麟《诗数》内篇卷六说：“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如《鸟鸣涧》《辛夷坞》，“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清人王士禛《书西溪堂诗序》说：“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所评或未免夸张，但已得其旨趣。王维是一个颇有修养的佛教徒，熟谙禅学，深受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玄宗开元时期，王维也曾积极入世，但天宝初年，因为对现实政治不满，意欲隐逸。后来经营蓝田别墅，虽在朝为官，又时常隐居辋川，亦官亦隐。隐居期间长持斋戒，日日禅诵，过着清心寡欲的居士生活。《辋川集》中那些充满禅意的山水田园诗不过是其隐居生活的写照及宗教情怀的艺术表达罢了。

就诗歌的艺术特点而言，《鹿柴》等五言绝句超旷空灵，玲珑剔透，如水中月，镜中花，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其意象风神屢为后世所称道，为后来神韵一派的诗歌创作开一方方便法门。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学术随笔



王者之气的发端

韩必省

云从龙，虎似风。龙腾于天，虎跃于穹。自古以来，老虎成为雄伟强盛的象征，常常用来表达中华民族威武的精神面貌和非凡的风范气度。

中国有崇尚老虎的文化传统，虎文化有着丰厚、深远的积淀，渗透到艺术审美与价值观等诸多方面。

我从事书画创作40余年，对动物工笔画情有独钟，画虎，也是我创作的主要题材之一。

仔细观察，临摹名作。从现实世界中提取虎之元素，通过对虎的骨骼、结构、肌理、皮毛、斑纹等内外形体及生理特征的精准描绘，使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老虎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在创作过程中，我把对老

虎外在形象进行细腻写实还原的同时，加以适当的艺术提炼，捕捉老虎威猛动作的瞬间动态，从神情、内心、眼睛、皮毛等方面，描绘出老虎比自然中更为完美的形象。

赋予老虎以拟人化的情感，也是我创作过程中追求的目标。大多画家在创作老虎题材的作品时，更多的是去表现老虎的生机与活力、威猛与强大。或上山，或下山，或跃起，或腾挪，这也恰好是老虎的主要特征。在老虎题材的创作拓展中，我曾试图通过展示老虎的“温情”，来表现和谐美好的主题。

新的一年，新的虎年，想起毛主席的著名诗句：“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王寅虎年，腾飞跃进的继续，王者之气的发端。（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